

高等學校教學用書

資本主義國家的 貨幣流通與信用

下 冊

Г. Я. 布列格里著

中國人民大學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譯

財政經濟出版社

高等學校教學用書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

下 冊

艾·雅·布列格里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本書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貨幣信用理論，對資本主義貨幣流通與信用問題作了科學的系統的論述。

本書分爲兩篇。第一篇闡述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結構內及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流通與信用的基本規律，說明資本主義貨幣信用體系組織上的特點及其各個環節的活動，分析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的貨幣流通與信用，以及批判資產階級的貨幣信用理論。

本書第二篇考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信用制度。

分類：課本

編號：0233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全二冊）

下冊定價(8)一元二角五分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貨幣
流通與信用教研室

原書名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и кредит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原作者 Э. Я. Брегель

原書出版處 Госфин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0年

出版者：財政經濟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

55.4，32型，132頁，206千字；850×1168，1/32開，8—1/4印張
1953年4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圖〕1—2,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零八號）

目 錄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的貨幣信用制度	287
第一節	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和兩個體系在貨幣信用領域中的鬥爭	287
第二節	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危機	296
第三節	1929 年以前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危機發展的各階段	302
第四節	1929—1933 年的世界貨幣信用危機	307
第五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資本主義的貨幣信用制度	316
第六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	324
第七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危機的尖銳化	330
第八節	戰後美國貸款和“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帝國主義擴張和侵略的工具	340
第十二章	對資產階級貨幣理論和信用理論的批判	356
第一節	金屬主義貨幣論和名目主義貨幣論的批判	356
第二節	貨幣數量論的批判	366
第三節	自然主義的信用論和資本創造的信用論的批判	375
第四節	為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服務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信用調節”論	385
第五節	小資產階級的貨幣和信用理論與空想的貨幣和信用理論之批判	393
第六節	作為資產階級辯護論之變形的修正主義的貨幣和信用學說與改良主義的貨幣和信用學說	399
第十三章	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俄國經濟科學中的貨幣理論和信用理論	408
第一節	伊·齊·波索什可夫的貨幣理論	408
第二節	亞·尼·拉吉舍夫論貨幣與信用	411

第三節	十九世紀俄國金屬主義的貨幣理論和名目主義的貨幣理論	416
第四節	尼·伊·屠格聶夫論貨幣和信用	420
第五節	1861年改革以前俄國經濟文獻中關於銀行問題的論戰	425
第六節	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論貨幣和信用	430
第十四章	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 貨幣和信用的學說	443
第一節	列寧論貨幣和信用的階級本質	443
第二節	列寧論帝國主義時代的信用和銀行	451
第三節	斯大林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貨幣流通與信用	458

第二篇 資本主義各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467

第十五章	英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467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英國貨幣信用制度的發展	467
第二節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英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473
第十六章	美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486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美國貨幣信用制度的發展	486
第二節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美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490
第十七章	法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506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法國貨幣信用制度的發展	506
第二節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法國的貨幣信用制度	510
第十八章	印度的貨幣信用制度	520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印度貨幣信用制度的發展	520
第二節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印度的貨幣信用制度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524
第三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時期印度的貨幣信用制度	534
後記		541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的貨幣信用制度

第一節 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和兩個體系在貨幣信用領域中的鬥爭

資本主義總危機最主要的特徵，是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候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種唯一無二和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體系；現時除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外，還存在有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它在日益增長，它在日益繁榮，它與資本主義相對抗，並且單只它本身存在的這一事實就顯示出資本主義底腐朽性，動搖着資本主義底基礎”^①。

國家政權的存在於工人階級手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人剝削人的現象被消滅，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的管理，人們為自己以及為自己社會的自由勞動，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生產關係完全與生產力狀況相適應以及經濟危機和失業現象的消滅，——所有這一切情形，使蘇聯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並使它在資本主義制度面前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

兩個體系的對立性，也表現在貨幣信用的領域中。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造成了一個全新的、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穩固基礎上的蘇維埃貨幣信用制度。工人階級的專政，將貨幣、信用和銀行由資產階級經濟的工具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工具。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貨幣是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經濟那裏拿到自己手裏來適應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 11 頁。

社會主義利益的一種工具。”●顯然，信用和銀行也是這種情形。蘇維埃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貨幣信用制度是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並且是大大地優於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貨幣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工具和榨取剩餘價值的手段。相反地，在蘇聯，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貨幣就不再是資本，而是為沒有人剝削人現象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服務了。蘇維埃國家藉助於貨幣，對於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有計劃的核算和監督，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實施經濟核算制，擴展蘇維埃商業，為社會主義積累而動員各種補充的資源，同時一貫地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由於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價值法則通過市場的價格波動自發地起着作用，而商品和貨幣流通就帶有盲目的、無計劃的性質。相反地，在蘇聯，價值法則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管理的基礎上，作為被認識了的必然性而發生着作用，而商品和貨幣流通則服從於國民經濟的計劃。貨幣流通的計劃化，是蘇維埃貨幣制度優於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優點。

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是極不穩定的，通貨貶值和通貨混亂幾乎成為一種長期的現象。蘇維埃貨幣制度優於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最大優點，是蘇維埃通貨的穩定性，蘇維埃通貨有着那樣一種真實保證，這種保證是任何一種資本主義通貨所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這就是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並按照穩定價格投入商品流轉中的巨量商品。當在資本主義國家正流行着通貨膨脹，勞動人民愈益陷於貧窮化的時候，在蘇聯，蘇維埃盧布的購買力則一貫地提高着，這就促進勞動者物質福利的增長。

●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見“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727頁。

蘇維埃信用制度對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優越性也同樣是很大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信用是資產階級的工具之一，資產階級用以使資本集積與集中並加強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蘇聯，信用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之一，蘇維埃國家用以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建設共產主義。

在資產階級國家內，服務於金融寡頭的利益並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大資本主義銀行，是信用制度的中心；在蘇聯，銀行體系則是社會主義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蘇維埃銀行體系在對社會主義企業提供貸款以及在各企業間實行非現金結算時，是以發展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為方針。

在資本主義國家，信用是盲目地發展着，它使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激烈化和經濟危機尖銳化；在蘇聯，信用則具有計劃性，它促使社會生產不斷迅速地增長，促使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蘇維埃貨幣信用制度之無危機的發展，是它對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重大優點之一。

在資本主義國家，信用是資本集中和剝奪小生產者的有力槓桿；在蘇聯，信用在小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曾起很重要的作用，它促進使農民免受剝削和貧困並為他們保證豐裕生活條件的集體農莊制度的鞏固。

最後，在資本主義各國，信用是大規模地被地主、證券投機者、資產階級國家用於非生產性的用途上；而在蘇聯，因為寄生階級已被消滅，國家本身指導着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所以信用就具有生產的使命，並且是社會生產力不斷高漲的槓桿。

信用是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工具之一。

在新興的蘇維埃共和國粉碎了外國干涉者以後，國際資產階級並沒有停止準備對蘇聯進行新的軍事進攻，而在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開始採取經濟的槓桿。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曾試圖利用信用來破壞蘇維埃國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恢復俄國的資本主義。但是，

他們所有的企圖都失敗了。

在 1920 年 9—10 月舉行的布魯塞爾國際金融會議上，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蘇維埃政府承認沙皇所欠的外債和給予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以行動的自由，作為外國提供貸款的必要條件。在 1922 年 4 月至 5 月的熱那亞會議上，各資本主義國家曾採取在經濟上和財政上奴役蘇聯的新企圖。“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國家提出了橫蠻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把十月革命收歸國有的各個工廠歸還給外國資本家，要求繳付沙皇政府所訂借的一切外債。在這樣的條件下，帝國主義國家諾許給予蘇維埃國家一些不大的借款。”●

很明顯的，蘇維埃國家拒絕了帝國主義者的一切要求，沒有向國際資產階級投降。資本主義國家想以金融圈套來套住蘇聯並用這種方法把蘇聯變為殖民地的企圖，遭到了完全的破產。當時他們曾採取信用封鎖的方法，以為拒絕供給蘇聯貸款，就會使蘇聯國民經濟的復興和發展成為不可能，並迫使蘇維埃政府向國際資產階級讓步。

對蘇聯的信用封鎖，表現在下面的事實上，即外國銀行不允貸款與對蘇聯的貿易，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無論是直接對蘇聯的貸款，或是担保由個別外國公司提供給蘇維埃貿易機構的商品信用，一概予以拒絕。例如，在英國，從 1920 年起所實施的出口信用國家担保制度在 1929 年秋季以前就不適用於對蘇聯的貿易。

人民的敵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充當了外國資產階級駐蘇聯的代理人，他們力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並為了這種目的而力主蘇維埃國家舉借奴役性的國外借款和承認沙皇所欠的外債。例如，托洛茨基分子出席 1923 年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時，即曾有這種投降的和賣國的提議。

然而，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的詭計終歸無效。蘇維埃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沒有用奴役性的貸款和外債，而是用自己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 333 頁。

的力量於最短的期間恢復了自己的國民經濟，並進而實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計劃。

以信用封鎖來破壞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企圖的失敗和擴大商品出口對於資本家本身的利害關係，迫使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與蘇聯建立相互的信用關係。

儘管恢復了貿易、信用的關係，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聯的鬥爭並沒有停止。鬥爭的方式之一是信用的歧視，就是說，對於與蘇聯的對外貿易的貸款，資本主義各國所規定的條件，較劣於資本主義各國彼此間的貿易貸款條件。這種情形表現在貸款的利率高和期限短上。例如，在1926年蘇聯和德國所簽訂的第一次信用協定中，利率規定為12.9%，而在同一年中德國國家銀行的官定利率却不超過8%，柏林的私人貼現率則不超過6.75%。1929年英國對蘇聯適用出口信用担保制度時，規定了對蘇聯的信用的保證金數額，年率是8—10%，這個數額比對其他國家提供信用時所採用的保證金率要超過一倍。

對蘇聯的信貸之限於純粹商品信用，以及資本主義銀行拒絕貼現蘇維埃對外貿易機關的票據，尤其是拒絕對它們實行直接銀行貸款，這是信用歧視的一種特殊方式。

敵視蘇聯的各資產階級政府，以種種方法從各方面阻礙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正常信用關係的發展。

帝國主義者曾指望用信用封鎖和信用歧視的方法破壞社會主義工業化，並迫使蘇聯乞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他們原擬利用這種幫助來便利外國資本奴役蘇維埃人民。但是，所有這些打算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蘇聯用自己的力量順利地克服了工業化的種種困難，並用社會主義積累的方法，依靠國內的來源動員了擴大重工業的資金。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十二周年紀念時，斯大林同志曾指出：“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得到什麼長期的借款和若干長期的信貸”，並且有充分的根據說，“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封鎖，可是

我們並沒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底基礎。”●

對蘇聯的信用封鎖的崩潰，並沒有停止帝國主義者破壞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正常信用關係的企圖。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這個工作做了不少的努力，散佈了關於蘇聯“沒有償付能力”的顯係虛偽的和誹謗的謠言。但是，這些破壞蘇聯國外信譽的企圖也都失敗了，因為外國債權人根據自身的經驗，都相信蘇聯一向是無可非難地履行了自己的義務，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由於 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機，却反而停止償付他們的債務。

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和貿易同時衰落的情形下，蘇聯經濟的不斷增長，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順利實現，以及蘇聯經濟和財政力量的鞏固，已使兩個體系力量的對比關係，急劇地轉變為有利於蘇聯。這種情形也表現在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信用關係的領域中。一方面，資本主義各國在危機和特種蕭條的情況下，努力尋求擴大自己商品銷路的任何機會，並確信蘇聯的無條件的償付能力，而表示願意擴大對蘇聯的貿易貸款。另一方面，蘇聯在自己的國民經濟發展中，已獲得重大成就，得到了經濟上的獨立，改善了貿易和支付差額，並大大縮減了與資本主義國家貿易方面的債務。

蘇聯對外貿易和外匯方面的地位之日益鞏固，已使蘇聯有可能要求資本主義國家改善貸款條件和停止信用的差別待遇。

在爭取改善貸款條件的鬥爭中，蘇聯得到了許多成就。第一，蘇聯拒絕了那些利息超過正常水平的貸款，而獲得了貸款費用的急劇減低。第二，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信用關係，開始更多地採取銀行對進口貿易的信用方式，蘇維埃對外貿易機關獲得了外國銀行（避免經過外國出口商）的直接信用。第三，蘇聯得到了信用期限的延長。例如，根據 1936 年與英國簽訂的協定，英國提供給蘇聯 1,000 萬英鎊的信用，期

● 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見“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 423—424 頁。

限5年，年息5分5厘，而根據1940年與瑞典簽訂的協定，提供給蘇聯1億克隆的信用，期限五年，年息4分5厘。

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信用協定，是完全與蘇聯的國際政策相適應的。還在1927年時斯大林同志即曾指出：“兩個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並不能消除這些協定的可能性”，並且除了貿易方面的可能的和適當的協定條件以外，還有“……信用方面的協定基礎，……而蘇維埃機關在償付貸款方面最為可靠，乃是衆所周知的。”●

帝國主義國家受着環境的壓迫，不得不與蘇聯成立信用協定並使信用條件正常化，然而絕沒有停止他們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他們曾利用自己的走狗——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這些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為外國利益和為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而進行損害蘇聯經濟和金融力量的破壞工作。

兩個體系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它發生在總危機的一切階段上，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並沒有停止，儘管反希特勒同盟曾把蘇聯和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和美國聯合在一起也罷。我們只要回憶一下，這些國家反動的右派集團，特別是共產主義和蘇聯的瘋狂敵人邱吉爾，他們在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是如何頑固地實行怠工就足以明白了。但是，他們削弱蘇聯的打算是失敗了，蘇聯的力量在戰爭的過程中並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地堅強了，並且正是蘇聯在搏戰中一對一地把希特勒的軍隊殲滅了。

在戰爭結束之後，建立起來了一個恢復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被戰爭所破壞了的貿易—信用關係的基礎。1946年10月7日蘇聯和瑞典所簽訂的信用協定，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該協定預定瑞典提供給蘇聯10億瑞典克隆的貸款，期限15年，年息3分，用以償付蘇聯對機器、電器工程及其他設備的定貨。斯大林同志在他接見美國合衆通訊社

●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123頁。

主席胡貝里時曾指出：“和瑞典所簽訂的協定，是各國經濟合作事業上的一大貢獻”。

但是，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是不會停止反蘇聯的鬥爭的，並將試用一切手段破壞兩個制度間的經濟關係。例如瑞典本身的反動分子們，特別是克萊格爾康采恩的利益的代理人，即曾反對信用協定和信用協定的批准。美國政府則更顯著的企圖用向莫斯科和斯德哥爾摩送致照會的方式來阻止蘇聯與瑞典協定的簽訂。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其中也包括信用方面的鬥爭，更加尖銳化起來。戰前，蘇聯是社會主義體系唯一的代表，而現時則各人民民主國家已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所以資本主義世界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現在已經成為不僅僅是反對蘇聯的鬥爭，而且也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鬥爭。信用就是這種鬥爭的工具之一。

帝國主義國家，絲毫沒有接受歷史的教訓，在它們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鬥爭中，又依靠那種它們過去企圖窒息蘇聯所曾採用的無效的同樣方法。這個方法就是信用封鎖的方法。例如，美國拒絕貸款與不願放棄自己的主權和不願作美國奴僕的人民民主國家，而貸款與那些準備以美國借款的一勺羹湯的代價而出賣其民族獨立的國家。例如，1946年美國進出口銀行根據國務院的指令，停止對捷克所進行的關於供給捷克 9,000 萬美元借款的談判，以及取消對波蘭供給同樣數額的貸款。

帝國主義者對人民民主國家方面所實施的信用封鎖，也表現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政策上。這個銀行是由美國壟斷資本家在裏面宰制，它一再拒絕借款與各人民民主國家（參閱以下第八節）。在波蘭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也就是說拒絕供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奴役以後，國際銀行立即中止考慮供給波蘭借款，這就是一個特別顯著的例子。

帝國主義利用信用的槓桿作為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工具，也表現在下面的事件上：美國供給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的借款，有一個最主要的

目的，那就是建立新的軍事—戰略橋頭堡和結成直接意圖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政治集團。無論“杜魯門主義”也好，“馬歇爾計劃”也好（參閱下面第八節），其目的都是如此。

帝國主義者對於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途徑的人民民主國家方面實行信用封鎖政策，對南斯拉夫的背叛社會主義事業和投降法西斯主義的鐵托及其黨徒們，却予以信用的支持。例如，在 1950 年年中，資本主義各國曾貸與南斯拉夫若干次貸款，總額計 50 億迪納爾，合 1 億美元。這些貸款大部分是由美國進出口銀行供給的（兩次 4,000 萬美元的長期借款）。

很明顯的，帝國主義者予鐵托法西斯黨徒以幫助，並不是無因的。這種幫助，乃是對於鐵托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敵視和挑撥政策，以及在南斯拉夫建立法西斯恐怖主義獨裁制度的一種獎勵，並且也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奴役南斯拉夫的工具。鐵托以空軍和海軍根據地供給美國，將銅礦和鉛礦的特許權轉讓與他們，並負責對外國資本家償付“國有化”企業的賠償費，以及負責償付戰前對美國的欠債——約 20 億迪納爾，這些都是顯明的例子。

帝國主義國家企圖利用信用封鎖作為經濟上和政治上壓迫人民民主國家的槓桿，乃是一種拙劣的圖謀。人民民主國家已作出這樣的榜樣，即不需要奴役性的國外借款就能夠恢復戰爭所破壞了的經濟。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使這些國家有了國內積累的來源，它們藉助於這些來源，在短時期內不僅達到了戰前的工業生產水平，而且還大大超過了戰前水平。馬歇爾化的西歐各國，工業正在衰落，失業現象正在增加，勞動者生活水平不斷地在降低，而各人民民主國家，則生產迅速擴大，失業現象已被消滅，人民大眾的物質幸福一貫地在提高。

蘇聯對人民民主國家的幫助，在人民民主國家經濟的迅速恢復和高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蘇聯的兄弟互助式的借款，是和美國的奴役性的貸款相反的。例如，1948 年 1 月 26 日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 1948

—1952 年期間蘇波貨物互相供售的協定和蘇聯以信用方式供售給波蘭工業設備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的規定，爲了償付供售的貸款，蘇聯供給波蘭 45,000 萬美元的中期貸款。1950 年 6 月 29 日簽訂了蘇聯與波蘭關於 1953—1958 年期間貨物互相供售的協定和 1951—1958 年以信用方式供售波蘭工業設備的協定，同時，爲了部分地償付這種設備供售的價款，蘇聯同意供給波蘭共和國數達 4 億盧布的貸款。

1950 年 2 月 14 日蘇聯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間所簽訂的協定也是兄弟般的援助的顯著例子。根據這個協定，蘇聯在五年的期限內提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3 億美元的貸款，作爲償付蘇聯所同意供售給中國的設備及其他材料之用，該項貸款的償還期限分作 10 年。在協定中指出：“蘇聯政府鑑於中國因其境內長期軍事行動而遭受的非常破壞，同意以年利 1% 的優惠條件給予貸款”。

蘇聯對各人民民主國家所提供的貸款，正促進它們的工業化、它們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勞動者物質福利的提高。

第二節 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危機

資本主義總危機引起了整個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危機，這個危機和前述(參閱第十章)的貨幣信用危機是應有所區別的。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危機，並不是意味着存款人的匆促擁向銀行提存和利率的提高等等，而是意味着貨幣流通與信用的穩定性的根本破壞；它不是周期性的危機生產過剩的表現，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表現，並且它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始終都是伴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的。

下面各種現象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貨幣信用制度危機最主要的表現：(1)金單本位制的崩潰和幾乎是長期的通貨膨脹；(2)借貸資本的長期過剩；(3)信用制度的寄生性的蛻化；(4)美國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財政奴役；(5)國際信用的極端不穩定和大批的“游動的”借貸資本的形成。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以前，個別國家內偶然地也有過通貨膨脹的情形。但它並不是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經常狀態，而是比較短期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起，36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只是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幾年期間沒有通貨貶值的情形。但是，在短促的資本主義通貨相對穩定時期以前却先已有過整整10年的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而在這個期間以後，整個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大混亂，新通貨膨脹和新通貨貶值，則反已延長了20年。通貨膨脹的龐大規模和幾乎是長期的性質，是資本主義貨幣制度危機的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資本主義總危機首先就是一個戰爭和革命的時代。由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極端不平衡性所產生的世界規模的戰爭，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貨幣制度，具有破壞性的影響。與準備和進行這種戰爭有關的龐大支出，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是用徵稅和借債的方法，而且也用發行紙幣的方法來彌補。通貨膨脹被資產階級國家利用作為把軍費負擔轉嫁在勞動大眾身上的工具，作為把戰爭後果和戰後災難轉移在這些勞動大眾身上的工具。

但是，不僅世界大戰引起資本主義通貨的崩潰和通貨膨脹。而且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和平時期，通貨的穩定，也只是一種短時期的偶然現象。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經濟危機的急劇尖銳化，是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破壞的重要因素。正是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通貨危機，甚至使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所實行的那些金本位的代用品也陷於崩潰（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參閱後面第四節）。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通貨膨脹對於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狀況的有害影響，特別強有力地表現出來。通貨膨脹成為壟斷資本的工具，有系統地被金融寡頭用以進攻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加強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增加自己的利潤（參閱第三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也反映在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上。借貸資本的長

期過剩，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所產生的信用危機的最主要的表現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擴大再生產的速度非常緩慢，就是資本主義腐朽性極端加劇的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16年期間（1897—1913年），世界工業產量變動指數增加了81.8%，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起的16年期間（1913—1929年），則只增了46.6%。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起工業的急劇衰落。而且因為這次危機以後並沒有一次新的工業高漲，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資本主義都是維持着極低的工業生產水平。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曾指出：“我國工業與戰前水準相較，已增至9倍以上，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却依然留在戰前水準周圍踏步不進，只超過戰前水平20至30%。”●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很緩慢，而借貸資本積累的速度却飛快地進展着，結果，借貸資本的增加與真實資本的增加兩者間呈現出空前不一致的現象。這種不一致的程度是如何巨大，可以由下面的情形看出：美國銀行的資本和存款在二十五年期間（1913—1938年）增加了200%，而工業產量只增加了20%；至於英國，則銀行的資本和存款增加了150%，而工業產量却只增加了13%。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借貸資本的豐富，正是生產資本積累薄弱的表現。因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速度極端緩慢，所以大批的資本不能得到生產性的運用，而分化成為借貸資本。借貸資本的長期過剩是發生在工業長期開工不足的條件下，並且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一種表現。

借貸資本，由於擴大再生產的速度緩慢而不能得到生產性的運用，就要在生產領域以外來尋覓自己的出路。因此，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在虛擬資本大量增加和擴大再生產速度緩慢之間就出現了嚴重脫節。1921—1930年期間世界有價證券的發行額，超過1901—1910年期

●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見“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900頁。